

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探析*

李 韦

提 要：吴雷川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于非基运动的回应中，形成了以耶稣人格为中心的宗教教育观。吴雷川努力将他的宗教教育观应用于中国救亡图强的实践中，他的宗教教育观是其处境化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韦，宗教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关键词：吴雷川 耶稣人格 宗教教育观 处境化神学

引 论

吴雷川是中国近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会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具体思想体现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著作和文章中。然而，吴雷川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教育家的身份而为世人所知的，更为响亮的称呼是“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吴雷川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和影响可从查时杰的评论中窥得一斑，“在教育工作上，有极杰出的表现，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良好，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学成绩十分出色，其中又以燕京大学为最”^①；吴雷川的主要社会活动时期正处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中，即从基督教启蒙中国的现代化教育到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相分离的过程，作为中年皈信基督教的吴雷川，他在这一过程中所阐发的教育观不仅是他对当时的“非基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进行回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是其独具特色的护教学的具体应用。

介于吴雷川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尝试在分析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的基础上，透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过程，并进一步反思吴雷川的宗教教育思想的特征。

吴雷川所构建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的主要思想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由主义神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②，但是这三种思想似乎都使吴雷川的

基督教神学缺乏超越的维度，再加上中国版的启蒙运动将宗教置于现代理性的对立面^③，原本在西方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基督教被吴雷川祛魅为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的基督教。可以说，吴雷川一生中对于基督教的认识经过了几次转变，但是他始终都以耶稣的人格作为其基督教思想的中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受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其他基督徒知识分子不同，中国时势的变化没有使他放弃原来的主张，反而使他更自觉地阐发基督教人格论^④。然而，吴雷川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在中国具体的语境中重新诠释了基督教，他每一个阶段想要塑造的“耶稣”形象却又不尽相同。

如果说，吴雷川的基督教思想是对非基运动的神学回应，而非基运动在一些学者看来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收回教育权的要求，那么，吴雷川的基督教思想的分期大概也可作为他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分期，或者说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不过是其基督教思想的应用和延伸。

一、耶稣的人格与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前途

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最为直接的体现在他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发展所做的种种规划中，这些规划主要涉及基督教教会和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吴雷川认为耶稣的人格是使二者获得生机的关键所在。

吴雷川认为，耶稣的人格是教会对当时的社会最大的贡献。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运动相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义和团运动等民族主义运动

而言对教会构成了空前的挑战,因为非基运动不仅沿袭了上一世纪的强烈的民族情绪,而且还运用了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入的各种理论武器^⑤。在此种境况下,基督教和教会的存在本身需要中国基督徒提供合理性论证。很多新文化运动的代表都倾向于用宗教的功能论置换宗教的本质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是是类观点的代表,然而激烈的反传统所带来的伦理亏空又为人本主义的基督教保留了极大的生存空间^⑥。吴雷川在此种背景下也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求伦理资源,并使之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的典范,宗教教育观念在整个教会层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吴雷川认为基督教的核心是基督,作基督徒就是要信仰耶稣并效法耶稣。吴雷川在非基运动前夕就已形成对基督教的这种认识,直到1936年出版自己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其最后一本著作《墨翟与耶稣》时仍未改变。吴雷川在自己早期的文章《我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中即对上述观点做了明确阐述,“自来教会对于这问题的解答,完全归于上帝。但我以为作基督徒,不只要信仰上帝,更是要信仰耶稣。也不只要信仰耶稣,更是要效法耶稣”^⑦。不仅如此,吴雷川在此文结尾处更为直接地说道:“所以我们信仰他,姑且不必说应当如何倚赖神权。却可以说实实在在的能增进人格。”^⑧从1921年至1927年整个非基运动期间,吴雷川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进行了集中探讨^⑨。总体上看,吴雷川一面抱着警醒的态度将教会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陈列出来,直面非基运动的批评,反省的结果就是将基督教打造为符合时代主流思想的宗教形态,即理性的、倡导社会服务的基督教;与此同时,吴雷川对非基运动中的基督教充满了信心。吴雷川对基督教的前途进行了乐观地预测:“自从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恐无发展的希望,或且一蹶不振了。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则基督教之遭人反对,正是它前途进步绝好的机会。”^⑩吴雷川乐观的原因不仅是非基运动为大众了解基督教和基督教内部的更新及改良提供了契机,更在于耶稣基督的人格能成为更新基督教的动力,中国的基督教和基督教徒都能实现自我更新,将基督的人格彰显于中国社会。可以说,以耶稣这个神人中介为中心建构的神学不仅是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结果,更是吴雷川根据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中所做的自觉选择。作为一名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吴雷川急切地希望中国基督徒能够在纷繁扰攘中将耶稣的人格这样简洁、明晰的观念作为自己修行的标尺。

如果从吴雷川所处的社会背景来审视其思想,可以说,吴雷川是自觉地确立中国语境中的耶稣的人格,然而,变化的中国的基督教的处境使得吴雷川的这种“自觉”亦可被看作一种“被动”。吴雷川早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会通中西文化,因为基督教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的审视下首先被贴上“洋教”的标签。吴雷川早期的多篇文章都致力于借儒家的思想资源对基督教进行重新诠释,以致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化基督教”^⑪。吴雷川构建“儒化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在于迫切希望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民众能够运用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养功夫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尤其是造成领袖人才的人格,从而能为中国文化的创新和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严峻,吴雷川虽没有放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基督教的对接点,但是他却明显更倾向于受社会福音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倡导以服务社会、变革社会为宗旨的基督教。于是,基督教就须以耶稣的人格为核心在“唤起民众”、“救国”和“乡村建设”等实际工作上有所作为。

对比吴雷川在非基运动或者收回教育权运动过程中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吴雷川始终将耶稣的人格作为中国基督徒践行基督教的核心原则,只不过耶稣在早期被吴雷川类比为中国的圣人,而在后期被类比为社会改革家。吴雷川实际上希望通过耶稣的人格这种象征符号为中国基督徒确立了一个可感的伦理英雄,如果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使基督教形成了极强的向心力,再转而化作一股改革社会的力量,基督教教育就在教会内和整个中国社会获得了成功。

二、耶稣的人格与教会教育的前途

既然基督教应该以耶稣的人格为核心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发挥其功能,那么教会学校的教育也应应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以培育具有耶稣人格的人才为宗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⑫。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各种思潮使中国民众逐渐开始用科学的、理性的和民族国家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教育。作为当时教育界的领袖,吴雷川对于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处境的变化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⑬。

首先,吴雷川基于基督教教育在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提出教会学校的宗旨应积极转变。吴雷川认为教会学校应该按照教会的两个原则进行改良,吴雷川心中的教会应当以引导社会为己任和以爱为根本教义,但是他指出当时的教会不符合这两个原则^⑭。吴雷川不久在《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下)》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教会学校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根据政府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对各教会学校联办高级中学以解决教会学校的经费和人才短缺的问题。吴雷川提出了几个教会学校改革的具体方案,第一,删除圣经功课,所有课程,都按照国家所定的标准教授;第二,废除每日强迫的早晚祷,并利用早祷的时间,举行朝会;第三,为基督徒的学生特设查经班;第四,增加教职员的薪金,慎选人才;第五,特别注重国文的功课。^⑮从这些方案中可以看出,吴雷川在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全面爆发之前就为应对第二次非基运动做好了准备。吴雷川之所以提出这些遭致当时很多基督徒非议的改革方案^⑯,就在于他对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有着独特的理解。教会学校在吴雷川看来应该本着基督教爱的精神感化学生,使学生具备耶稣的人格,而具备耶稣人格的中国学生必要为中国社会服务,因此,教会学校是否非要抱守一些宗教教育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彰显基督教的精神。按照这种逻辑,教会学校可不必冠以教会附设的名称^⑰;甚至“宗教教育”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宗教”和“教育”都属于精神层面,只能靠教会学校老师人格的感化和学生自己的体会,而非同于一般专业技能的教育^⑱。然而,吴雷川并不反对所谓的宗教教育,只是倡导对原来的宗教教育理念进行革新,教会学校不再进行传统的、以传教为直接目的的各种活动并不意味着教会学校失去了传教的功能,因为“从事实上论,办学自办学,传教自传教,绝不能并为一谈。但在功效上论,也可以说办学正是传教;……”^⑲

在对教会学校办学宗旨的上述认识之上,吴雷川积极推进教会学校的立案。吴雷川不仅对政府颁布的教会中学立案的规定积极回应,并努力以政府和教会之间“桥梁”的身份通过撰文向基督教界说明立案的必要、向政府表明教会教育的爱国性质。吴雷川作为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坚定地站在国家的立场倡导收回教育主权,还在于他为教会

立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五卅运动”之后,教会学校的学生跟学校当局发生诸多冲突,并且发生集体退学的现象。吴雷川一方面认为教会应当向政府立案,并提出上中两策,“上策”是校长请华信徒担任,学校规章都遵守政府要求,校中的经费仍由教会供给,以教会私立的名义立案。“中策”是学校不隶属于教会,但将校舍和学校中的设备,让或借给华信徒办理,经费由华人自行筹募,成为纯粹华人私立学校^⑳。事实上,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立案以后正是走过了从“上策”到“中策”的历程。另一方面,吴雷川倡导学生用理性的手段促进学校的改革,他认为改革之后的教会学校会消除一切缺点并享有和公立学校相同的地位,如此,学生就没有必要离开教会学校。经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教会学校在趋同于公立学校的同时保留了基督精神的特质。

其次,吴雷川认为基督教会的青年学生运动是宗教教育改革的范例。青年学生团契所体现出来的一些新气象在吴雷川看来预示了整个基督教以及基督教教育发展的趋势。1926年燕京大学新校址落成,此时燕京大学已经正式向政府注册立案,燕京大学的状况如吴雷川描述:“所有校内课程及组织,已完全与普通私立学校,无所差别,……然就事实方面而言,私立学校规程中,明许学校得由宗教团体设立,则宗教团体所设立之学校,与宗教发生密切之关系,自属当然之事,……”^㉑燕京大学在迁至海淀之后成立了燕大基督教团契,这个以学生居多的团契在吴雷川看来真正体现了基督教教会的精神,因为它是信教者自发建立、各教派合一的教会组织,而且这个团契还真正体现了教会精神,契友们平等、友爱^㉒。及至1935年,基督徒学生团契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吴雷川在《一封写给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信》中肯定了学生团契的已有工作,尤其是基督徒学生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吴雷川殷殷期望他们效法耶稣的人格注重个人修养、注重服务民众^㉓。不仅如此,吴雷川还认为应该用耶稣的人格来引导当时为基督教团体服务的青年^㉔。总之,基督徒学生运动在吴雷川看来代表了教会奋兴的希望,他们是基督徒青年在国难之际出于对知识阶级颓废消沉、漫无组织的反思而积极巩固自身、扩大影响的运动^㉕。如果说,吴雷川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积极支持教会学校立案,那么基督徒学生运动等一系列基督徒青年所取得的成

绩都可谓是印证了吴雷川对于宗教教育改革的主张,即教会并非要实施强迫的、以传教为目的的教会教育,只要基督徒将耶稣的精神表显于世,基督教教育和传播就是成功的。

吴雷川之所以对基督教教育持这种观点,根本上在于他认为基督教和国家主义并不矛盾,因为吴雷川认为耶稣也是爱国的^⑥。非基运动爆发之后,国内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教会内部对时代问题的反应颇为一致,并初步构建起了国难神学^⑦。吴雷川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对基督教的理解最终由“唯爱”走向“暴力革命”。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经历痛苦的犹疑和挣扎之后将其砝码转向了俗世的目标,因为中国基督教社会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是非超越性的,中国基督徒在处理“既处身于世界,又不属于世界”这一课题时的张力感十分强烈,使他们更有可能走向某一极端^⑧。所以,基督教在吴雷川那里成了国家主义的基督教,基督教教育也成了国家主义的基督教教育,而“基督教教育”因为同样能够成就人们完全的人格而符合国家教育的宗旨。吴雷川教育观的转变清楚地体现在他较晚出版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他在这本书中将教育定位为推动文化的工具,然而他却未直接阐述自己对于教育的具体意见,而是引述了叶青的《我对于教育的意见》一文的主要观点。叶青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当时的需要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因此教育的内容也应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⑨。宗教教育自然也应遵循教育改革的宗旨,而吴雷川在摘录叶青的文章要点之前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理由:“……可见现时教育不合实际的需要,就是党政当局也不否认。至于改革的建议,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很多,……惟叶青氏有《我对于教育的意见》一文,是从国家民族立场上说明中国现时的需要,因而决定教育所应当采取的方针,所以依着他的主张,教育必得要整个的改造。”^⑩由此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在吴雷川看来已经或者说必须超越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当然,此时的吴雷川还认为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

非基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基督教主要受国家主义的批评,国家主义积极推动了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在此过程中,教会对国家主义的回应分为几派^⑪,而吴雷川则认为基督教教育和国家主义并不矛盾。例如,吴雷川积极提倡教会学校要

加强国文教育,他的呼吁更为直接地推动了国文教育在燕京大学中的地位转变^⑫。吴雷川的这一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挣扎和思考的过程的,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伴随着基督教教义中的“爱”和“公义”、宗教实践中“唯爱”和“暴力革命”之间关系的思考。吴雷川对这些看似矛盾的命题都是按照兼容并包的态度进行处理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基督教中有很多高于国家主义的原理,但是为了应对国家主义的挑战,基督教可以降格从之,开发自身适合国家主义的价值^⑬。

三、耶稣的人格与爱国青年

吴雷川认为基督教和教会教育要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到维系和发展,只能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对基督教和宗教教育进行改造,使基督教能够在救国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上表显基督的精神。然而吴雷川认为耶稣的人格不仅对基督教内部的更新起着塑造作用,还是爱国的非基督徒青年应当效法的,可以说,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吴雷川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集中撰写了几篇旨在向爱国青年介绍耶稣的文章。吴雷川在对“三一八惨案”的教训进行反思后,认为耶稣作为爱国者的成长历程是值得爱国青年了解和借鉴的。吴雷川首先解释了选择耶稣作为中国青年之完人之范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诸圣哲,“多半是享有遐龄,并且历史上所遗留的传记大都偏重在他们人格养成之后的言行,而于其人格如何养成,则少有记载,以至于青年人所当有的步趋,往往不能适合”^⑭。吴雷川首先通过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将耶稣描绘为反对一切势力的革命家,一个为了完成自己改造社会的目的进行周密计划、不惧牺牲的爱国者^⑮;另一方面,吴雷川提出中国前途的改进寄希望于具有创造性的青年人,而当时社会环境的堕落无益于青年人的自省,所以青年人需要树立新的精神标杆作为自身修养的指导。吴雷川认为通过耶稣一生的事迹可以总结出六条值得青年人吸取的教训,即对于自己的前途有精密的计划、凡事当求己、善用一切机会、凡事必须服从真理、为人要始终一致和坚信人必能改变环境^⑯。可以看出,吴雷川认为耶稣值得效法之处只是其人格,他惟愿青年人在进行社会改造等诸多创新性事务时能够从耶稣的人格获得精神动力,以取得最终的成功。

吴雷川之所以极为重视青年学生的人格养成

是因为在他看来青年学生是民国唯一的生机所在^⑤。青年学生们为了救国进行了宣传、示威游行等工作,然而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首先奋发在带给人们希望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救国方式的争论。吴雷川认为当时对于救国的说法主要有四种,即读书救国、人格救国、人才救国和奋斗牺牲救国,他还指出前三者其实都还是重在修养预备,只有奋斗牺牲是需要实践的。然而,吴雷川反对当时人们认为说注意修养就等于独善其身,他认为独善其身并且实行孟子的“穷不失义”才真是救国的种子^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是在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处境变迁中逐渐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基督教从一度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被接受逐渐转向其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遭反对,当然,这个过程背后交织着“中西古今”各种力量的博弈。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和他的宗教观一样带有化约性质,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塑造青年人完全的人格,而教会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塑造具有耶稣人格的人。按照吴雷川对于宗教教育的理解,他的宗教教育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基督教内的教会学校和青年都应本着反省、开放的心态应对社会的变迁、积极参加爱国和救国的实践。在此前提下,教会学校应当勇于变革。对于作为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先遣军”的基督徒青年所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吴雷川则希望耶稣基督的精神或人格能够成为其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吴雷川因为认为基督教是当时社会中富有朝气的精神力量,符合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需要,所以他认为即使是非信徒、肩负复兴中华重任的青年也应当汲取耶稣为基督的精神,从而宗教教育就达到“无形无相”而浸润其中的理想效果。

总结和思考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教育界领袖,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是在对非基运动的回应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宗教教育观是他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的一部分。故,吴雷川的宗教教育观和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一样,都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救亡图存作为压倒性的力量成为吴雷川宗教教育观的出发点。吴雷川将塑造具有耶稣人格的人作为教会教育的目的,并且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将耶稣分别塑造为爱国者、革命者。吴雷川这种对于教会教育偏于主观的理解,甚至受到来自赵紫宸

的批评,赵紫宸说:“吴先生似乎要改变基督教的性质,使之迎合他自己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的改革运动。”^⑦而吴雷川倡导对社会、经济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救国。当救亡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时,吴雷川眼中的基督教或者教会教育就具有了工具性质。于是,吴雷川认为人们完全没有必要了解西方传统文化中孕育出的“耶稣”原有的丰富内涵,更没有必要深入辨析基督教的神学义理,教会教育的目的指向也就从彼世转向了此世。

其次,吴雷川对教育改革的倡导和他在教育界的种种实践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第二次非基运动中,吴雷川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燕京大学在吴雷川的推动下顺利完成注册^⑧,而吴雷川的教育部副部长身份事实上也使他在整个中国教会学校的中国化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绝大多数教会学校的立案注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伟大胜利,基本上结束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中、外教育并存的半殖民状态;注册问题的解决也是中国历届政府坚持非宗教的世俗化教育政策的胜利,为坚持信仰自由和教育中立原则奠定了基础^⑨。

最后,吴雷川以耶稣人格为中心的宗教教育观同样也是采取了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强调思想和文化改革的优先地位的做法是当时知识分子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后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然而这种反思却仍没有脱离文化民族主义的窠臼。于是,正如文化民族主义只有走向政治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繁荣的道路,吴雷川的耶稣的人格在反思中完成了相似的过程,即从爱国者转变为革命者,其反思的模式决定了其突破的限度。

(责任编辑:若火)

*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11CZJ008)。

- ①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香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 ② 《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对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渊源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参见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06—161页。
- ③④⑤⑥⑦⑧⑨ 孙尚扬、刘宗坤:《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第56、24—33、402—406、61—62页。
- ④ 卓新平、许志伟:《基督教研究》(第五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542页。
- ⑤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页。

- ⑦⑧吴雷川：《我所信仰的耶稣基督》，《生命月刊》，第9、10期合刊，1921年5月，第1、4页。
- ⑨吴雷川在非基运动期间撰写了多篇文章探讨基督教在华的发展前途，如《论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途》，载《真理周刊》，第11期，1923年6月10日；《再论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途》，载《真理周刊》，第22期，1923年8月26日；《我对于“基督教在华之前途”的意见》，载《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12期，1926年11月30日；《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载《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7期，1926年8月4日；论中国基督教会的难题载《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11期，1927年等。
- ⑩吴雷川：《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7期，1926年8月4日，第193页。
- ⑪《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一书中对吴雷川从“合儒”、“补儒”两个方面建构的“儒化基督教”作了详细分析，参见李韦：《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第43—54页。香港学者陈广培围绕着“儒化”的吴雷川的基督教思想从多个视角做了探讨，参见陈广培：《吴雷川的圣经观及诠释进路》，《山道期刊》第19期；陈广培：《耶稣在拯救中的角色：吴雷川的儒化拯救论》，《山道期刊》第15期；陈广培：《儒化基督徒吴雷川的宗教神学观探析》，《辅仁宗教研究》2002年第6期。
- ⑫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除此之外，早在198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中就收录了很多由各界人士撰写的表明基督教和中国教育事业之密切关系的文章，而近年来出版的研究著作日益使人们看到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吴梓明的《基督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史静寰、王立新合著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 ⑬五四运动之后，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已经有所觉察，为了在教学方针上应对这些变化，早在1915年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就提出了组织教育调查团的建议，后因种种原因直至1921年中国教育调查团才开始调查工作，在结束调查后，他们提出了应对中国挑战的教会学校的新口号“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
- ⑭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改良的我见（上）》，《真理周刊》，第16期第一版，1923年7月15日。
- ⑮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下）》，《真理周刊》第17期第一版至第二版，1923年7月22日。
- ⑯吴雷川在《真理周刊》第29期中专门针对读者文南斗对于其提出的教会学校改革的方案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从文章节选的文南斗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文南斗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一时难以接受吴雷川如此激进的改革，而文南斗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基督徒对于教会教育的看法。参见吴雷川：《讨论——中学生的圣经和祈祷当真要废除么》，《真理周刊》，第29期，1923年10月14日。
- ⑰吴雷川曾专门例举北京平民中学作为教会学校改革的范例，他认为北京平民中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却得到当时诸多教育家的赞赏，事实上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所学校是教会事业的一部分。参见吴雷川：《述所得于北京平民中学的感想敬告全国基督教会》，《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5期，1926年6月。
- ⑱吴雷川：《我的宗教教育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3卷第2期，1927年8月，第21—22页。
- ⑲吴雷川：《教会学校的以往及其将来》，《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3卷第1期，1927年2月，第16页。
- ⑳吴雷川：《教会学校转变的新机》，《真理周刊》第3年第16期第一版至第二版，1925年7月19日。
- ㉑吴雷川：《燕京大学校舍落成典礼致辞》，《真理与生命》，1926年6月，第12页。
- ㉒吴雷川：《燕大基督教团契的成立与中国教会的改造》，《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10期，1926年11月，第285—288页。
- ㉓吴雷川：《一封写给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信》，《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8期，1935年1月，第402—406页。
- ㉔吴雷川：《我们怎样能尽引导青年的责任》，《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期，1929年3月，第4—7页。
- ㉕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17期，1935年3月20日，第35—36页。
- ㉖吴雷川：《国家主义与基督教是否冲突》，《生命》，第5卷第4期，1925年，第4页。
- ㉗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第324—326页。
- ㉘㉙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版，第248—250、249页。
- ㉚胡卫清将近代基督教对国家主义的回应分为四种：有保留地赞同国家主义的原则、国家主义并非唯一必须遵循的原则、基督化教育与国家主义并不矛盾和教会学校必须改良。参见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8—416页。
- ㉛1923年，燕京大学16%的经费是用于宗教学院的，只有3%是用于国文教育的；但是到1930年，这个比例反过来了，且在之后的二十年都保持不变。参见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2.
- ㉜㉝吴雷川：《中国青年不当效法耶稣么？》，《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8期，1926年9月30日，第221、224—225页。
- ㉞吴雷川：《与爱国青年说耶稣》，《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1期，1926年4月，第2—3页。
- ㉟㊱吴雷川：《与现代青年商量救国的问题》，《真理与生命》，第1卷第11期，1926年11月15日，第311、314页。
- ㊲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7期，1936年12月，第426页。
- ㊳Dr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 Education in Asia, 1959, pp. 202—203.
- ㊴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8页。